

中国摄影家
CHINA PHOTOGRAPHERS
HE YANGUANG

主编 陈小波

贺延光

眼光

REPORTING FROM BEIJING



贺延光生命的热能因影像而释放
他每一次的闪耀
都与国家命运的痛楚与转折交相辉映
他以难以想象的坚定
站立在事件前沿
在他身上
你永远找不到静观、冷漠、局外、粉饰
这样的字眼 →

中国摄影家·贺延光

眼光

主编 陈小波

REPORTING FROM BEIJING

CHINA PHOTOGRAPHERS: HE YANGU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光/陈小波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摄影家·贺延光)

ISBN 978-7-300-08444-2

I. 眼…

II. 陈…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摄影艺术—艺术评论—中国

IV. J421 J4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0368号

中国摄影家·贺延光

眼光

主编 陈小波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lt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秋雨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190mm × 245mm 16开本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字 数 127 000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对贺延光来讲，摄影是一件充满人性和高度理想主义的事情。借着相机，他一直有力地叙述事实，并透过客观的事物表达主观的信念和感情。借着相机，他走近中国百姓，传递他们的苦乐与悲欢、劳作与收获。

贺延光认为，摄影是为了防止遗忘。为了记住即将遗忘的重大事件，他不停拍摄：老山自卫反击战、华东水灾、广西边境大排雷、北京SARS……他还用镜头对准身边的琐事，记录社会的变迁。

贺延光一直坚持：在事实面前，记录比技巧重要，影像背后的问题比影像表面的情趣重要，新闻比自己的名字重要。站在事件的前沿，贺延光陈述着自己的责任感，也陈述着用图像自身言说的基本常识。

——编者



中国摄影家



特约编辑 谱 庄
责任编辑 翟江虹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图文设计 田 驰
郑华卫

序

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急流涌来，急流涌过。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尤然。谁还记得从白石桥到中关村的那条破路，偶或有辆机动车从浓密的树阴下开过，树阴下一个老太太坐在蝉声下面，坐在两个大保温瓶后卖三分一根的冰棍？1971年，取水路从苏州到杭州，客船转在连绵不断的芦苇荡里，那景象更像在唐宋人笔下，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两岸楼房灯光却非常非常遥远了。现在的少年青年，听说“文革”，听说1976年……影影绰绰，像是听说玄宗故事。说起这些，连我们自己也难免隔世之感。生活流水般逝去，一些镜头抓住我们，仿佛我们要通过它们抓住生活。眼前的这套摄影集，借助比我们自己更广阔的视野，更具穿透力的视线，把这些镜头摆到我们眼前。

照相机镜头未必从不撒谎（想想“大跃进”时期那张新立村人民公社两个村姑坐在亩产可达12万斤的稻子上的照片），但它在纪实方面确有优势。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一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理解。

这十位摄影师都是研究者，他们的摄影作品、他们的生活历程，无不表明这一点。他们在借助相机进行研究。研究并不只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长。实际上，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而这十位研究者，无论风格和题材多么不同，各个都执著于真切的关怀，关注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一群人。他们对某一片断现实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关注，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启发我们的思考。

一个山村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为世界，不在于涵盖的面积广大，你可以从北京飞到巴黎，从巴黎飞到圣保罗，可你出出入入的，只不过是会会场，你说的听的，还是上次会议说过听过的那些话。这里也许有全球化，但没有世界。世界是我们取食于此、欢笑于此、相濡以沫于此、丧葬于此的生活整体。这套摄影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世界。

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那里生活着一些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纪实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百姓，这该不是偶然的。这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像。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那么绚烂，但由于紧接地气而实实在在。今天，满街广告上，满电视屏幕上，漂亮脸蛋儿，标准曲线身材，满是靓丽的影像。它们都像从工艺品厂新出炉的工艺品，没有土地，没有历史；漂亮，然后空空如也。当年我们满眼看到的是空洞的政治宣传品，在心智健全的人眼里，理想一旦流于空洞就不再是理想，只是令人厌恶的欺骗；我猜想今天心智健全的青年看到那些空洞的靓丽，也早觉得厌倦甚至厌恶了吧。

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影像却不缺少美。我是个外行，不能从形象配置、采光滤光、抽象质感来谈论这些作品。我不懂怎样让照片产生质感，我猜想仅仅让照片产生质感是不够的，那背后更需要生活的质感。我，像很多日子过得不错的城里人一样，习惯了浮光掠影。在这些照片中，生活的质感在顽强呈现，它们在纪实的同时，似乎也在召唤，把我们大家唤向较为质朴的生活。

2007年8月9日写于北京

陈嘉映 哲学家

主编的话

二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历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年代，我们共有的精神场域成为我的宝藏。

我一直对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怀有深深敬意。我也对那些研究摄影史的同行怀有深深敬意。无论是两年前做的“摄影家访谈系列”，还是这次编辑《中国摄影家》丛书，我的本意都不是刻意要证明这些记录者的记录何等有价。我只是想为将来的摄影史留下一份有根据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纪实摄影的切入点。

在这里，摄影家将为我们展示个人的摄影历程甚至生命历程。我们能听到当事人——中国重要的十位纪实摄影家对自己的坚定陈述与界定，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局限和疆界，我们还可以读到影像学者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为解读摄影家所提供的引导。

做报道摄影编辑二十余年，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关注纪实摄影中健康力量的成长，也决定了我与这样的摄影家不弃不离，互相引为同道。

这里选择的十位摄影家不是摄影英雄，但他们立足土厚水深的大地，是一些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情感，长时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摄影者。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们记录了切切实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瞬间和社会形态。他们的摄影描述人的处境，每一幅照片都和人的心灵直接发生关系。

朱宪民用一生记录一条伟大的河流，乡愁的境界在他那里变得温暖而通达；吴家林地独行，守住本分，他宿命：“命定该我拍下来的东西我一定不会错过”；胡武功的作品“民间记忆”所具有的原创力来自他内在的思想深度，他心灵的力量在每一幅照片上打下烙印；侯登科拍摄西部地区候鸟一般的麦客，自己却像候鸟一样追逐着炙热的阳光离我们远去，今天在这里展现的侯登科作品已然成为真正的经典；王文澜以他罕见的感悟和微妙的平衡能力，从中国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积累着无尽宝藏；贺延光在业内获得的尊严来自于他的责任感，他坚持常识，把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放在职业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于德水如一块水中的顽石，淡淡地立定激流，他的情感和作品早已与泥土糅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姜健试图把私人图像变成公共记忆，他的环境肖像系列成为中原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王征采集的大规模文字与图像构成有关回民的一段历史，对本民族的卓绝记录成为他的巅峰之作；黑明寻找的尽可能是公共话题而不是摄影话题，他也由一个普通的摄影者变成“命运观察家”……

感谢摄影家，他们的天才和个性给我灵感。虽然做朋友多年，因着这套书，我和他们往返于我们之间的智慧通道，无数地倾谈和聆听。他们借我力道，使我完成了心愿……

2007年8月8日写于北京皇亭子
陈小波 新华社高级编辑



贺延光 2007

徐京星 摄

数字影像
PDG

光荣所在

贺延光

做记者这么多年，我总算明白了，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大众读者，所以对新闻记者谈使命也好，谈责任也好，应该超越派别的利益和标准。在我看来，能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我们讲“实事求是”这么多年了，但实际上在这个轨道上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我们从未听说有什么人对“真实性是新闻作品的灵魂”有异议，但做起来，仍是五花八门。旧的观念、错误的东西，惯性很大，它们在新观念新潮流面前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每年，我们都能发现有假照片粉墨登场，轻的“添枝加叶”、“张冠李戴”；重的“生编硬造”、“无中生有”。

我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这些年能聊以自慰的是，还没有读者质疑我作品的真伪。新闻摄影抓拍的难度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记者的职业良知、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影像表现技巧的水平。

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

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即便到了新闻现场，我仍要不断地提示自己：此事的背景我是否清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我是否明白？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才能保证影像的成功？因为凡事只有自己弄懂了，同时必须依托图像自身形式的表达，才有可能向读者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

2003年年底，我去人民大会堂拍摄做飞天报告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路上，巧遇一队民工扛着行李过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的照片说明是“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头晚，京城入冬后突降大雪，数百万棵树木被风雪折断。”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命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杨利伟和农民工都是我们国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难分清他们孰轻孰重。所以，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只要带着照相机，职业的状态就是最重要的。轻视或厌倦身边发生的社会新闻，对记者来说足以致命，而那些摄影大家，什么题材都能驾驭，都能拍出不错的作品来！

新闻摄影作品并不都是为了观赏，它的记录功能就是为了防止遗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社会前进来说越是不可或缺、值得思考的事，摄影记者就越无权拒绝，越不能和它保持距离。

一个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莫能比在引人关注的事件中拍到精彩照片，并能在读者中产生大的反响更令人满足的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我们要向那些不畏艰难、不惧危险拍摄照片的摄影记者致敬，他们拍摄战争是为了让人们厌恶战争，他们拍摄灾害是为了让人们认识自然，他们拍摄苦难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贫穷。

我想，这正是所有勇敢、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摄影记者的光荣所在。





中国青年报社三代摄影记者合影

(前排左起) 侯立印、王裕量、贾化民、铁矛、王厚林

(后排左起) 李建泉、晋永权、贺延光、徐京星、张志刚、张左、程铁良、解海龙、柴继军、江菲、石洪涛

目录

这个人 / 杨 浪 /	3
不应忘记的镜头 / 胡武功 /	9
延光 / 钱 钢 /	11
横竖都是贺延光 / 邓 维 /	15
贺延光侧影 / 卢跃刚 /	17
还新闻摄影真实的魅力 / 程铁良 /	21
幸好我们有贺延光 / 刘咏秋 /	25
历史不能空白——与贺延光对话 / 杨小彦 /	27
眼光（1977—2007） / 贺延光 /	33
关中追麦客 / 贺延光 /	83
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 任 悦 /	105
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 / 李 楠 /	109
经历九江——从违反纪律到中国新闻特别奖 / 贺延光 /	143
生命备忘录 / 贺延光 /	162
道德观念与价值判断——比肖夫和贺延光面对世界的态度 / 林 路 /	201
职业的良知——贺延光访谈 / 陈小波 /	205
我的自述（节选） / 贺延光 /	216
编后记 /	240

这个人

杨浪

如果说在中国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个人——30年前他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时候已经为摄影界所关注,30年后他并未居摄影界的最高岗位却被公认为摄影界的旗帜性人物;他不但是新闻摄影的组织者还是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冲上一线的实践者;像他的作品一样,他对新闻摄影的议论和批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一些人不一定喜欢他的尖锐议论,却不能不对他抱以尊重,他的影响不仅在于摄影,更在摄影之外——这个人就是贺延光!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存在对摄影界意味着什么?

这代人……

1951年出生的贺延光是中国摄影界的“前代英雄”,却也是摄影界的今世标杆。在持续30年的时间里,始终站在潮头,以自己的采访、作品和思想在中国新闻摄影界留下重要印记的,在他那一代摄影人里,是不多见的。

问起对贺延光的印象,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面旗帜。”的确,在过去30年里,无论是1976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前游行的人流里;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在抗洪抢险最危险的地方;在SARS肆虐的病房里,乃至在国共领袖会谈的大会堂,贺延光都给历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影像。

他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的人。是的,“革命激情”——这是贺延光成为他这一个人的特质,更是他这一代人的特质。

贺延光的父亲是延安干部(这或许也是“延光”这一名字的来历),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后转业到地方企业负责宣传工作。他的姥爷是黄埔学生,加入中共以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牺牲,姥爷的遗书在家里传了两代,一直传

到贺延光手中。

5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许多人是上一代革命者的直系传人。“优越”也罢，“盲从”也罢，上一代的血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基因。贺延光回忆他儿时的事情：“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天中午，我排队打饭，怎么等也等不来我父亲，后来又见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拉了一条凳子，站上去大声向人们说：现在发生了重大事件，有40多个孩子中毒了，赶紧去抢救！大家夺门而去。后来才知道，这些孩子是把木板车上装的一种什么化肥当白糖吃了。父亲的一呼百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熟悉贺延光的人都能在这里看到今天他的身影。

遗传？并不尽然。“文革”中那些自命“优越”睥睨天下的干部子弟如今多数都已无声无息了，这里有个人的修为造化，也有偶然的命运因素。

“文革”初期，正上初三的贺延光在北京南城一所普通中学上学，尽管他也当了红卫兵的小干部，但是并没有狂热和张扬的机会。说来好笑，这时的贺延光竟然有些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的痕迹：因为是外地转学来的，口音不对，年纪又小，功课还比较差，所以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加上在一个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里，没有“干部子弟”扎堆的环境，他也“狂”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贺延光没有什么“旗帜性”的业绩，倒是由于父亲做宣传工作的潜在影响，他参加了当时首都红卫兵组织的《长征组歌》合唱团。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还清晰流畅地记得当年的许多老歌，这也算后来的摄影家贺延光一段重要的激情文化因缘。

因为近视，贺延光没能当兵，于是和那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样上山下乡来到东北建设兵团。从这个时候起，他的人生速率开始进入加速过程。从1968年到1973年，短短5年中，贺延光经历了冰天雪地中艰苦的劳动，1969年珍宝岛作战后紧张的战备时期，1971年“9·13”事件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震动，他也从兵团战士，到拖拉机手，到武装值班班的基干民兵，当到了基层连队的一个小干部。

整个60年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子宫。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亢奋；是处皆有的“阶级敌人”与助人为乐的雷锋叔叔；极度跌宕的岁月与宗教般辉煌的“未来”；于是，极度的遵从与极度的叛逆构成了这一代人精神频谱的震荡两极。

这一代人大大都经历过这样的艰苦——“在沼泽地和丛林中开路。前面刚开出了路，后面的又翻浆了，耗费着人力和物力。蚊子咬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为了躲蚊子，爬到树上去解手。这太玄了，只因为上面有风，好受些。后来又想出什么办法？拉个汽油桶，挖个坑横着放进去，桶上打个窟窿，谁要解手，就往桶里放一把干草，点着，让烟熏着自己的屁股，实际上整个人一起熏。”^[2]

这一代人也都有过这样的劳动——“有一次，紧急卸运37节车皮的水泥，一百三四十号人，除了炊事班留下一个人熬大碴子粥，全连连长、指导员带头都上去了。那会儿干活，一点机械没有，全靠人扛。那牛皮纸包装的水泥袋，几个

来回就把人的肩膀磨破了皮，又是夏天，疼得可想而知。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干就是一个礼拜，所有人的肩膀都是血糊糊的。那时人都不要命了，因为我们的施工是为战备，战备是为和苏修打仗，打仗是为保卫毛主席，所以，你的表现总是和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的。”^[3]

正是这样一种对理想和社会的纯情奉献，“9·13”事件给了这代人极大的震撼——“团长进来了，他披着军大衣，坐在通道中间一张小课桌后边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念文件：中共中央中发 XX 号文件，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傻了！我们全傻了——副统帅啊？！他的四野从北打到南啊？！接班人啊？！永远健康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如同五雷轰顶，我听到这些感到浑身发麻，无法理解，这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有一种这么多年上了个大当的感觉。”^[4]

1973年，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贺延光“困退”回到北京，到一个街道小厂从一个青年工人迅速成为厂里的青年干部。那是“文革”后期中国政治中最微妙复杂的一个时期，各种各样正道和小道的消息和言说，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的关系，捕捉着未来中国政治的风吹草动。人们在思考，那批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当时还年轻的人们开始了有目的的追求。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1968年，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1975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1977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这是朱学勤笔下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与这些青年同时，食指写下了《相信未来》；阿城继续着他的文化哲学研究；王克平开始了他的现代木雕制作；‘四月影会’，一个半地下的民间摄影团体渐渐集结；正在那个街道小厂当‘领导’的贺延光为邓小平的‘整顿’大声叫好。

于是，1976年的4月清明，这些人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那个最重要也最险要的关头，以那种最激情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4月1日，贺延光带着厂里80多名团员青年做了个花圈——“都是手工做的花圈，剪的松枝，做的纸花，我写的悼词——送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那是这一代人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以最激情的方式把江山社稷为己任的理想化做行动，哪怕被捕坐牢。正是在这一段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中，贺延光从

一个被捕的案犯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委员，《北京青年报》记者。

只有了解这一代人，才能理解贺延光。1976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是这一代人和他的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新一段历史的开始。

这拨人……

整个的80年代如同“五四”运动前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这个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又是此时中国思想景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思想解放的洪流与滞涩陈腐的块垒；泰斗们重新发热的紧迫与新锐们舍我其谁的激情；那时时尚的话语是“解冻”、“昭雪”与“拯救”，时尚的读物是“批判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时尚的歌曲是《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时的青年才俊们是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哩哩啦啦的“个人”——登上了“舞台”！

当邓小平开启这段历史的那一瞬间，王文澜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国日报》；邓维刚从山西来到北京上大学；刚拍了《上访者》的李晓斌还是个勤奋的摄影发烧友；正在经贸大学就读的鲍昆继续着他的摄影爱好；贺延光放弃了可能的仕途，来到《北京青年报》开始他的专业摄影生涯。总之，一切刚刚开始。

贺延光在“四五”事件中带着照相机的，而且拍了四个胶卷。不过在他被捕以后的特殊经历中，这些影像未能保存下来。是在1982年，我对贺延光的摄影作品留下印象的，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编辑“星期天”副刊，贺延光的一幅表现建筑工地的照片被“星期刊”选用，那是一个很昂扬的画面，很劲朗的情绪。当时同样富于激情的我一定是对这张照片表示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鼓励，以至于延光后来总打趣地跟我说：“杨浪那时根本不懂照片，居然跟我说，那张片子上要是添一块云就好了。”

我当时会这样说的。那是一个放言无忌的时候，更是一个放言无忌的环境。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报》是当年新闻界一面无可争议的旗帜，在思想解放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引领了80年代报纸改革的潮流。这叫生逢其时，躬逢其盛，延光正是在这个时候的1983年调入《中国青年报》的。

今天看当年的《中国青年报》，她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为中国的报业历史留下了印记。首先是广开言路，批评监督，思想解放的被称为“中青报亚文化”的氛围。无论是1980年首开报纸批评，刊登了青年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吃客饭”；青年人生观大讨论；《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言论厘清“清污运动”中的“左”的思潮；还是报社内部整个的思想风气，都是那样一种理想主义加浪漫激情气质下的热情澎湃、勤思敏行、公开平等、议论风生，这氛围至今令人感怀。关于中青报的传统，现任总编辑陈小川曾经总结过三句话，即：“新闻业务的自由讨论，统一明确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和青年进步）和理想主义的职业追求”。

理想主义激情背景下的自由讨论，是以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来实现的。1998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批评李谷一《乡恋》歌唱方法的稿子，尽管这稿子体现了当时权威的意愿，在报社内部还是引发了极大的争论。还在此时，报社群众工作部还刊发了一篇“群众来信”，就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一位著名青年诗人的个人婚恋问题提出指责。当年，以“道德法庭”为名，控诉各类“陈世美”也曾是一时之风尚。还有一位如今蜚声史学界的学者的情变问题，也曾成为该报群工部外调的事情。以主流媒体，在法律之外干预个人生活的做法，在编辑部也引起很大争议，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在内部多次公开提出对这类报道的强烈不满，最终影响了对此类问题的报道立场。

80年代《中国青年报》集聚的一批人才团队，对此后中国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团队是有一批老同志引领的，由一批经过“文革”中基层锻炼而拔擢的青年才俊组成的，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中青报总编辑、此前在北京医学院人事处工作的陈小川；有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来自某工厂的米博华；有以《交锋》一书震动90年代思想界的前语文教师马立诚；后来以组织《冰点》专刊而闻名的李大同这时还是驻内蒙古的记者；后来中青报最著名的“行动记者”叶研这时刚毕业分配到报社。前后来到这这家报社的还有前街道清洁工、理发员，也有前大队书记、车间主任、乡团委书记，当然还有“四五”事件的“英雄”贺延光。

延光说：“在中青报的20多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我不再认为记者是喉舌，我不能去鹦鹉学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谁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是媒体恰恰是人们最需要去展示思想的地方。”^[5]

正是在《中国青年报》这个新老传承、薪火相递，青年人才相互砥砺、相互影响的事业平台上，贺延光成为一个现代新闻理想和摄影理念的实践者。

作为80年代乃至此后《中国青年报》新闻摄影工作的主要组织者，贺延光竭力呼吁强化新闻摄影在报纸中的地位，一时，中青报摄影图片刊发体量之大，摄影版面之多，质量之精彩为各报瞩目。他还直承老一辈摄影家衣钵，对新闻摄影中的虚假现象进行无情痛斥和批驳。在摄影活动的组织上，贺延光积极推动《中国青年报》主导的连续几届“青年新闻摄影十佳”评选，为青年摄影群体阵容的兴盛和现代新闻摄影理念的形成尽心竭力。

当然，这一切，始终以他持续勤奋的新闻摄影实践为依托。

这个人……

一个时代成就一批人。个人又必然地受环境的影响。所以贺延光成为贺延光。

他是那一代人里最早“出道”的，也是在新时期最早获得主流社会承认的年轻人，有句套话，叫做“是那一代人里的出色代表”。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代